

不公的囚徒：以色列的拘留系统与哈马斯的绑架策略如何维持痛苦循环

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长期的冲突在囚徒的循环中悲惨地反映出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任意拘留、酷刑和非人化系统，以及哈马斯作为回应采取的绑架行动。这两种做法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不断消失进入一个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系统的威胁之下，而以色列人则为被武装团体扣押的亲人而悲痛。结果是一个创伤、愤怒和激进化的无尽反馈循环。

这一循环本可以被打破——最近的一次是在2023年10月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可能释放双方被扣押的人员。但以色列政府在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受到极端分子的推动，选择了升级冲突而非外交，将关键谈判者边缘化，延长了痛苦。以色列拒绝结束其非法的拘留制度并拒绝外交渠道，使痛苦的螺旋进一步根深蒂固。

以色列的拘留制度：制度化的不公

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使用行政拘留和军事法庭作为控制工具。这些机制完全在国际法律规范之外运作。巴勒斯坦人可能基于秘密证据被无限期监禁，无需指控或审判，也没有有效的上诉途径。军事法庭的定罪率接近99.7%，它们作为强制工具而非正义工具运作。这些做法直接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和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和第14条）以及《第四日内瓦公约》（第64-66条）。

酷刑和虐待是系统性的。联合国机构和人权组织的众多报告记录了殴打、压力姿势、水刑、电击、性羞辱和用物体强奸的使用。2015年的一份报告列出了2005年至2012年间至少60起性化酷刑案件。这些行为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和第16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后者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酷刑。

自2023年10月7日起，这些虐待行为急剧增加。截至2024年8月，至少53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在拘留期间死亡，许多人身上带有酷刑痕迹。年仅14岁的儿童也被迫裸体并遭受羞辱性待遇。实际上，在这种条件下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还被剥夺了人性。鉴于其系统性本质和对平民施压的意图，这些行为可能符合1979年国际反对劫持人质公约中关于劫持人质的定义，包括在伤害或死亡威胁下拘留个人以迫使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是巴勒斯坦社会——采取行动。

巴勒斯坦社会的心理摧毁

任意拘留造成的创伤远远超出了监狱的围墙。家庭生活持续的恐惧中，担心亲人——尤其是儿童——会在夜间被带走，与外界隔绝并遭受酷刑。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逮捕”一词并不意味着正当程序——它意味着失踪、暴力和可能的死亡。截至2024年，超过9500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助长了集体恐惧和悲痛。

这种广泛的痛苦并未导致被动，而是抵抗。绝望寻求答案的家庭和社区常常转向唯一承诺有影响力的实体——武装团体。这不是为暴力辩护，而是承认心理现实：当你的孩子被非法监禁、遭受酷刑，且你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活着的时候，尽一切可能确保他们回来的本能是深刻人性的。这种心理必要性，虽然在国际法下不是辩护理由，但却是理解哈马斯策略的关键。

哈马斯的绑架行动：非法但可理解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绑架了251名以色列人质，震惊了世界。这一行动根据**1979年人质公约**是非法的且在道德上不可辩护，该公约明确禁止扣押平民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然而，哈马斯并非凭空发明了这种策略——它有历史先例和心理逻辑。

2011年的吉拉德·沙利特囚犯交换，以一名以色列士兵换取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释放，这一事件在巴勒斯坦人中强化了只有绑架人质才能带来结果的观点。由于以色列的法律系统为被拘留者提供不了通往正义的途径，哈马斯利用人质作为谈判筹码——这一策略在伦理上令人憎恶，但在政治上却有效。再次强调，重点不是为这一行为辩护，而是直面其根源：一个被残酷对待的社会，相信外交和合法性毫无价值。

因此，道德和法律上的等价性不在于方法——绑架和拘留——而在于它们根本的非法性和非人化效果。以色列的任意拘留和哈马斯的绑架行动都违反了国际法，并且都针对平民。一个由国家批准、常规化并披上法律官僚主义的外衣；另一个则是惊人而即时的。但两者都是胁迫、创伤和绝望的同一循环的一部分。

共同的痛苦

以色列一方的悲痛是深刻的。人质家庭承受着难以忍受的不确定性，无法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否还活着，更不用说他们何时或如何回来。他们的痛苦反映了巴勒斯坦家庭在不同名称——“行政拘留”——下经历的同样的缺失、恐惧和无助。

这种平行的痛苦本应为同理心创造空间。相反，它被武器化了。在以色列，要求停火和人质协议的抗议者被忽视或驳回。以色列人质家庭，包括像海姆·鲁宾斯坦这样的人物，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政府为了政治利益牺牲他们的亲人。

错失的机会与政策失败

走出这个深渊的路径是存在的。2023年10月，由格申·巴斯金领导、卡塔尔和哈马斯联系人调解的幕后谈判提供了相互释放的可行框架。但内塔尼亚胡强硬的政府，被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等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导，拒绝了这些提议。当时在人质谈判中担任关键官员的奥伦·塞特因错失机会而辞职抗议。

这不是战术错误——这是道德失败。优先考虑军事升级而非人道解决方案并未解放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它加深了痛苦，推动了进一步的激进化，并巩固了将囚徒用作战争工具的做法。

打破循环

结束这一循环不是从空袭或人质救援开始，而是从拆除使之成为必要的结构开始。以色列必须废除其任意拘留和军事法庭系统——这些做法摧毁了法治，滋生了暴力报复。如果不解决这一核心不公，任何临时停火或交换只会推迟下一轮绑架和流血。

正义不能是选择性的。谴责哈马斯绑架行动的同一原则也必须拒绝以色列对平民的无限期、非法监禁。在这两种囚禁形式被废除之前，两个民族都将继续是相互痛苦滋生的系统的囚徒。